

作者簡介

張履鵬（1929～2020），天津市寧河蘆臺人，早年曾經在河南省內的研究所和大學從事農業技術、農業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，擔任過教授和研究員職務有多項研究成果，享受國家有貢獻專家津貼。學術團體中曾任河南省農史研究會會長，首屆中國農業歷史學會副理事長，中國農業經濟史學會副理事長。退出崗位後，租田數畝，躬耕於鴻溝，不輟書生之筆，將滿懷興國策，述於三村種樹書。

提 要

宋朝是由農耕文化發展的起來的國家，經常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。經歷三百餘年，以儒家治國為理念，得到社會顯著進步、理學和經濟同步發展，其動力是致力於社會改革。

集市貿易是社會進步的重要表現，打破了前代「重農抑商」和「市坊制」。由集市貿易起始，發展城鎮，開展海外貿易。

集市貿易興起的基礎是農業改革的「佃耕制」。宋代實行「不抑兼併」、「不設田制」的土地政策，把土地推向市場。農民土地依附關係鬆弛，選擇職業有更大的周旋餘地，許多人從事集市貿易，農產品商品化。城市的發展，容納了大量的「三教九流」、「五行八作」服務行業人員。在宋代「商民」已經不是「四民」中的「末業」地位大大提高，原因是「資本主義」市場經濟的興起。宋代吏治清明，百年無內亂，出現許多明君賢相，民間少有冤獄。人們富裕，茶樓、酒肆、旅店、浴池、遊樂場所大發展。

隨著集市貿易興起，經濟改革應時推進。稅收制度適應了市場經濟。貨幣是用量大增，並且開始應用「紙幣」，是歷史上一大創舉。

總之，宋代是我們值得研討的改革開放朝代，崖山之後標誌著中國古典時代的終結。征服者是文化上落後於被征服民族的游牧民族，正常的社會發展進程被打斷，商品經濟發展遲滯近千年。

紀念張履鵬先生

張先生年逾耄耋而筆耕不輟，是我社幾位高齡作者之一。去年接到《宋代集市貿易興起及其成效》來稿，排版剛成，卻得知先生仙逝的訊息，此書遂成遺作，令人悲痛。

六年前，蒙鄭州大學歷史系王星光教授推薦，有幸結識張先生，得其《中國八年抗日參戰各軍傳略》一稿。先生時年八十五，身體強健，很有些「不知老之已至」的氣概，要親至北京，將書稿面交與我。

北京城交通系統複雜，若非衛星導航，本地人也容易迷路，何況八十多歲的外地老者。我勸他郵寄即可，老先生卻執意要來：「段祺瑞執政的時候，我就在北京讀書，對北京熟悉得很！」我想，老先生大概不知道北洋政府時期的北京，跟現在的北京不一樣吧？

結果卻證明，我低估先生了。那時，正逢我社總編輯杜潔祥先生來京，遂邀張老先生一聚。張老先生輕車熟路，徑至酒店門口與我們會合。其時，先生腳力已衰，每邁三、五步身軀即一顫，但堅決不許人攙扶。很難想像，他是怎樣邁著這樣的步子，從鄭州一人來北京，又從火車站轉車到酒店的。其心意之專，意志之堅，可見一斑。

如此年紀的老人，生逢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動蕩時代，有放不下的心結。張先生第一放不下的，是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國軍將士，需得正名。他說《中國八年抗戰參戰各軍傳略》一書，不需要做太多評價，將事實擺出來，公道自在人心。

另一件放不下的，是普通民眾沉沒在歷史巨浪之下的冤屈。那一年，他與我們聚會之後，說要去看看老朋友，還要去北京大興區做調研，因為那裏

曾發生過一起歷史上有名的滅門慘案。「連孩子都殺，沒有天理！」我還記得他說這話的神態，雪白的頭髮，隨腳步的蹣跚而顫抖著。

後來，張先生《宋代奠定的佃耕制及其後世沿革》《中國農業歷史研究》二書，也先後交由我社出版。特別是《中國農業歷史研究》，出版後被國務院收為參考書，張先生很高興，專門寫信來與我分享此事。

張先生年事越高，著述越勤，很有些「以學術養生」的興頭。去年他再次聯繫我出版新作《宋代集市貿易興起及其成效》時，年已 90，社中同事都驚嘆，六年來著述 4 大冊，是老先生一生學養厚積薄發的成果。當時我還在想，有這樣的勁頭，老先生百歲可期。

不料今年春季，先生仙逝，這本書成了他對我們最後的託付。願此書的出版，能告慰先生在天之靈。

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副總編輯楊嘉樂
2020.7.26